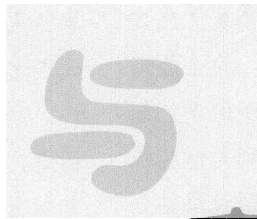


儒家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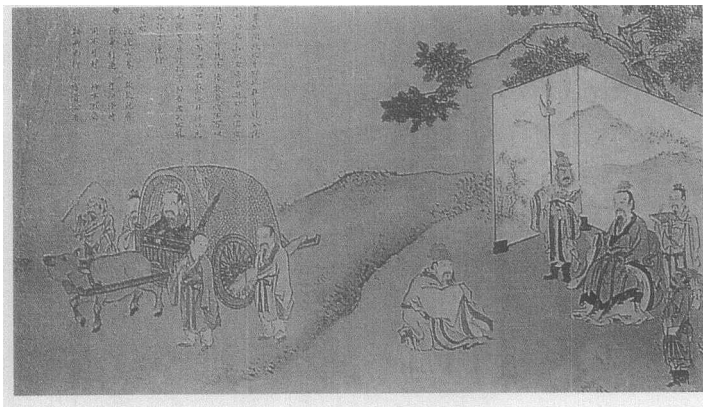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权

文 / 陈志尚

(一)

2500年前由孔子开创,历代后继学者不断解释、补充、发扬而形成的儒家学说,开始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后来经过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儒学实际上上升到国家哲学的地位,成为



国家实行各种制度、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的理论根据,成为人民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必需遵循的指导原则。之后,尽管历代皇朝更替,儒家学说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和统治地位一直延续着,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皇朝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止。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儒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

近代以来,如何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国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全盘肯定不容批判的保守主义,另一种则是数典忘祖、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主张所谓“全盘西化”。1919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纲常伦理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对中国民主科学的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但在对待传

统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当时也有过缺乏科学分析,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的形式主义缺点。1966-1976“文革”十年的所谓“反四旧”、“批孔”,则是极左思潮全盘否定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错误。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继承传统文

化,特别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美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我个人认为,对待儒学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首先坚持客观性原则,做出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立足新的时代特点、结合新的实践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学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一方面,它汇集了很多总结我国人民几千年社会实践经验而陆续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生带有普遍真理性的认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风格;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具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已经过时的东西,以及必须予以批判和扬弃的已经没落、腐朽的封建性的东西。

从中国文化研究和宣传的现状看,有两种倾向值得

注意：一种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全面了解，不懂得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把面向世界、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文化同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对立起来，重视前者忽视后者，甚至贬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因而导致少数人出现一种新的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对传统文化，不是根据对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事实，通过科学分析，如实地给予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评价，而是出于主观偏见或某种实用主义的需要，对人对事都只讲好的一面，有意回避其有问题的不好的一面，断章取义加以美化，无原则地给予吹捧，甚至颂古非今，结果是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给人提供真实可靠的知识。显然，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只能误导人们特别是青年，对精神文明建设起消极的、有害的作用，都是应该防止的。

(二)

如何看待儒学与人权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儒家的封建传统，如纲常名教等等，与现代人权是格格不入的。批判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旧的意识形态，正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和改革胜利的文化前提。时至今日，在中国，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彻底破除包括儒家在内的封建观念的严重影响，仍是实行和改善人权状况的重要思想条件。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关于“仁”的理论。对什么是“仁”，如何实现“仁”？孔子本人有很多阐述。我认为“仁”是以孔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表达其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的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孟子都强调“仁”就是“爱人”。这就是说，“仁”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可以理解为普遍地爱一切人（所谓“泛爱众”），以此作为人生的出发点、理想或目的。但在实践上，儒家是反对墨家的“兼爱”，主张“爱有差等”的。儒家所主张的“爱有差等”至少客观上导致肯定一部分人（即所谓大人、君子、劳心者、男人等）享有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即所谓小人、

劳力者、女人等等）的特权的合理性。孟子就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怎样才能实现“仁”，做到爱人呢？孔子认为最根本的是“克己复礼”，而且要求人们必须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说，必须克制个人的欲望，战胜自己的私心，恢复礼的权威，一切思想和行动都自觉符合而不违背礼的规定，以此作为准则。一个人只有这样做，才算实践了仁。所有人都这样做了，才能实现仁的目标和理想。那末究竟什么是“礼”呢？孔子本意是指周礼。《左传》引孔子的话说：“礼，经周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说“吾从周”，“复礼”就是要恢复实行建立在家长制和等级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周朝的政治体制、社会组织、典章制度、道德规范等社会的上层建筑。这说



明孔子当时在政治上是偏于保守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也承认周礼要有所“损益”（改革），是提倡“温故而知新”的。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孔子是“述古而非复古”。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以说是有尊重传统而轻视创新的倾向。这都可以继续研讨。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仁和礼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讲的就是人们应该如何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而当时主张“克己复礼”的实质是要个人克制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维护和服从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社

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实际上是压抑个性、维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特权。这很难说是与现代的人权概念相容的。而“克己复礼为仁”正是绝大多数儒学思想家所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当然孔子之后,特别是进入秦汉,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后继者们对“礼”的涵义的解释也从周礼变为封建社会的礼,即封建的政治体制、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即所谓纲常名教等处理人们社会关系的规定。但实质内容仍然是体现统治阶级即封建皇帝、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剥削统治阶级的等级特权。所以就儒家关于“仁”的学说的主要的本质的方面来说,与现代人权是正相反对的。

为了说明儒学传统与中国人权的关系,还应该回顾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已不能维持旧的封建统治,也不能为新的社会变革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批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19世纪末发生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都明显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人权思想。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根本原因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势力的弱小,广大人民群众没有真正觉悟和组织起来。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领域2,000多年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根深蒂固,渗透到几乎所有人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至风俗习惯等等,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人们的行动。因此要救中国,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唤起民众”。1919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实际上是用现代自然科学和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新文化,集中冲击和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旧文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创造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环境,为世界各种新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因而成为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和先导。

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都是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反对宗教神学,而五四运动则主要是反对儒学为主的封建等级传统

和伦理道德观念;前者从14世纪算起到20世纪前后长达600年,即便是作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准备的启蒙运动,也几乎长达一个世纪,而中国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前后不过20年。可是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之急迫、激烈和进步之迅速。但另一方面,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说明,旧的社会意识的消灭还不够彻底。即便是在封建制度已经消灭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由于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仍然严重存在并继续发生着消极影响,彻底消除其思想影响,仍然是文化建设和人权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此决不能低估。

(三)

儒学本身是一个矛盾复合体,全面分析儒家学说,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思想都是与现代人权对立的。其中确有一部分思想、格言从一个侧面凝结了几千年中国人民社会实践的宝贵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涉及人们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内容,也包含有现代人权思想的萌芽或因素。如历代儒学著作中强调天地之间人为贵,主张爱人,维护人的人格尊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平等待人;政治应以民为本;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贯彻到人们的社会关系中,追求“天下为公”,人人平等、彼此和谐共处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等等。又如,在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群体、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儒家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家长制和等级专制基础上的群体主义(也有人称为整体主义、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其中也有很多忧国忧民、主张国家民族利益优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等等。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非常深刻和合理的见解。即使是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在过滤掉封建的伦理杂质之后,也都有正确的成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予以认真发掘的。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并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新的意义,使之发扬光大,正是我们建设包括人权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责任编辑:陈振功)